

災難的啟示

釋如石

英國社會學家提特摩斯發現，二戰期間，向來保守、拘謹的英國人，忽然變得比較隨和、開朗起來，會主動和陌生人交談，而且臉上露出「無虛飾」的笑容。人類學家唐恩伯也注意到，倫敦人平日鮮明的階級意識淡化了，大家可以不分彼此擠在地窖、防空壕或地鐵站裡避難，互相關照，感覺十分溫馨。還有許多倫敦人驚異地發覺，他們在戰爭期間的生活，遠比戰前或戰後顯得「更充實」。某些人甚至表示，他們喜歡戰爭，因為上戰場和每天上班的感覺很不一樣，作戰比較像真正活著，特別是在冒險解救同袍的時候。人性美好的一面，竟然在充滿血腥的戰爭中被引發出來，真是不可思議。

其實，這種患難見真情的感人場景，在突如其來的天災地變中也屢見不鮮。災難專家弗利茲說，浩劫過後，倖存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尋親友，有很高比例的人會投入救災工作，傷勢較輕的災民也會催促救難人員去救援其他傷重者，表現出更多的體諒。可見在集體危機中，人們顯得更樂於互助，更具有同胞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道德和精神生活提昇之外，負面的行為也相對減少。醫學統計資料顯示，在地震、水災等劫難之後，精神科的病人驟減，自殺率趨緩，欺詐、竊盜與搶奪等犯罪率也都普遍降低。

以上總總跡象顯示，社會集體悲劇之發生，確實有助於個人道德與精神生活的提昇。然而我們不禁想問「為什麼？」難道民胞物與的慈悲情懷只在南亞海嘯等浩劫中才會自發性地呈現嗎？

當然不是，人性的良善面肯定不只在災難中才能凸顯，平時透過媒體，我們也可得知不少捨己為人的感人事跡。德國大哲叔本華曾撰文表示：奮不顧身救苦救難的無私行為，幾乎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不過，這些日常的善行義舉，顯然出自少數善根深厚的善心人士和虔誠教徒，多數人不是無心、乏力，就是不敢。

芸芸眾生為了養家餬口，或追逐名利、權位，整天忙於應付外在的人事，對生命的「存在」無暇多顧，以至於清明的靈知日漸昏昧，活像齊克果筆下的「醉農」：表面上看，是農夫自己駕著馬車；實際的情況，卻是識途老馬拖載農夫回家，因為農夫早已醉得東西不辨了。世人如此汲汲營營，日復一日，雖然不無所得，但所得愈多，迷失也愈重，生活愈來愈苦悶、荒謬，人情也逐漸疏離、冷漠；除非慣性的生活與思想型態被迫暫停，讓心靈有回神的空間。而突如其來、震撼人心的天災人禍，就像一頓棒喝，正好可以迫使日常的制式生活與僵化思惟中斷，讓心靈回返較原始、純真的狀態，重拾生命「存在」的自覺與自珍，從而觸動「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惻隱情懷。此情一生，利他的善舉自然水到渠成。

如上所說，既然災難足以喚醒人性美好的一面，那麼它們與「能淨化憐憫與恐懼之情的希臘悲劇」就有異曲同工之妙了；因為透過觀賞《普羅米修斯》等希臘悲劇，同樣可以感悟生命基底的一體之理，並在面對共同的命運時，捐棄成見，互相關懷。事實上不僅觀賞悲劇如此，冥想耶穌受難，照樣可以激起基督徒對「生命苦難」的深切悲情；而思惟生命「有漏皆苦」的真諦，不但足以引生厭離，導向解脫，還能進而引發大悲，志成佛道。因此，寂天在《入菩薩行》中說：

苦難有諸德：厭離除驕慢、悲愍生死眾、羞惡樂行善。

生命的本能傾向於「避苦求樂」。弔詭的是，眾生避之唯恐不及的苦難，竟能引生多種功德，甚至還蘊含了導致解脫生命的真理。既然苦是生命本質的一個面向，那麼它就像陰影之於形體一樣，是不可能迴避得掉的。唯有停下腳步，端坐樹陰，止息一切造作，靜慮默觀，由觀察苦、體認苦，進而放下苦；或依般若正觀，直捷「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